

忆“左联”诗人冯宪章

任 钧

今年三月二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五十周年纪念日。

际此光荣节日的前夕，我不能不回忆起在左联宣告成立的第二年，就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病死在上海漕河泾监狱的诗人冯宪章。

冯宪章和诗人殷夫，生活、斗争在同一年代。他是最早参加左联的年轻诗人之一，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

他原籍广东省兴宁县，跟梅县相邻。他的中学生活是在梅县度过的。我曾经跟宪章在东山中学一起念过书。时间是：从“五卅惨案”发生后的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四·一五”事变，也正是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段时期。

“五卅惨案”前后，在广东已经正式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打倒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其后又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

尽管当时我们都还是些不大懂事的中学生，但“形势比人还强”，大家已经开始高唱响遍城乡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革命歌曲，并把作为东征主力部队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军，当作崇拜和学习的对象。

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从国外回来，一直在广东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并亲自领导两次东征。在第二次东征后，他就留在广东东江地区，担任东江各属行政专员，负责惠州、潮州、梅县所属各地的行政领导。邓颖超同志也在区委工作，是区委妇女部的负责人。有一次她因公来到梅县，我们学校还特地把她请了来，对全校师生员工讲过一次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的斗争环境的影响下，在周总理等革命前辈的直接间接的教导和启发下，我们学校的青年学生都开始睁开眼睛，怀着“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信念，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迈出了第一步。热情、敏感、坚强的宪章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他拿起笔来很能写，口才也不错，所以，很快就作为学生会的干部，参加了校内学生会宣传部门的工作。后来，还参加了“新学生社”，再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

“新学生社”是在党领导下的当时广东的进步学生团体。总社设在广州。它是在革命政府经过两次东征赶跑了军阀陈炯明之后才在各县建立起来的。宪章是在梅县参加得最早的一

批成员。

“新学生社”成立后不久，梅县也有了共青团的组织，他也很快就参加了。

这样，他就变成了我们学校里最忙碌、最活跃的同学之一。

难得的是，宪章不但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做好了所担负的各项工作，而且对于学习也抓得很紧。他当时已经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除了学好学校里的功课之外，还阅读了不少当时在图书馆里借得到、在书店里买得到的新文学书刊。在他寝室里的书架上摆着好些鲁迅、郭沫若及蒋光慈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在当时的同学中是很突出的。

而且在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的同时，他也就开始写起诗来了。

由于我自己当时也同样喜欢阅读鲁迅以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开始学习写写诗，所以彼此也就变得更加接近和要好，常常趁课余之暇谈谈有关阅读文艺作品的心得和体会，或交换自己所写的东西，互相提些意见。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手造成的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不但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浩劫和灾难，也使包括宪章和我在内的好几百东山中学的年轻同学遭受到一场沉重的打击！我们的母校被加上一种莫须有的罪名给封闭了！宪章和我也跟其他几十个同学一样，由于“革命有罪”，给明令通缉，还到处贴出了所谓“缉捕归案”的布告。

于是，宪章和我以及其他平日在学校里较为活跃的同学都只好离开学校，被迫流亡。最初，我们跑到离开县城不远的名叫西阳的小镇上，在一所小学里暂住。但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我们随时有被抓的危险；因此，只耽了很短的时间，就化整为零，暂行分散了。

其后，在一九二八年当宪章东渡日本留学时，我曾写过一首题为《送行曲》的短诗，发表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海出版的《海风周报》上，其中有一小节曾写到我们当年流亡的情况：

……朋友！我们又握手言别了！

这不禁令我忆起去年在西阳相别的一朝——

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群流亡的“罪人”，

那时候遍地都已被魔烟缭绕。

我们恰似被猎人穷追的小鹿，

今天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落入魔爪；

但我们的意志仍旧无比坚强，

并不因此而稍有动摇；

我们胸中的反抗烈火也烧得更旺，

决不因此而熄灭掉；……

直到环境再也不容许我们在一块了，

我们才暂行分手，在那风雨萧条的一朝。……

诗尽管写得很粗糙，很不成熟，但所表现的情景和思想感情倒是真实的。

回想当年我们母校被无理封闭后，我们几百个年轻同学的处境是够狼狈的了！简直是徬徨歧路，不知何去何从？其中有几个不久前由遥远的南洋回国就学的华侨女同学，由于过于天真、幼稚，在学校封闭后还在街上抛头露面，就给反动政府抓了起来，几被枪杀！事实上，自从这次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我们县里就陆续有好些教师和学生，在杀人如麻的极端疯狂的

白色恐怖中，或成批、或个别地丧失了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而他们在不久前都是曾经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

那是个多么黑暗、多么残酷、多么野蛮的年代呵！……

自从在太阳分手后，宪章就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去了。由于当时的险恶环境，由于彼此的生活都极其不安定，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关于他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少。有的资料谈到他曾经参加广州公社的赤卫军。关于此事，他却一直没有跟我谈起过，因而只好待考。

宪章于一九二八年初从广东来到上海，考进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他到上海后就认识了蒋光慈、钱杏村（阿英）等人。那时适逢太阳社在上海宣告成立，他就通过蒋、钱的介绍，参加了该社。当他到上海的前后，已写出了不少的诗歌；给蒋光慈看后，颇获蒋的赏识。因此，在太阳社的机关刊物《太阳月刊》创刊号（一月号）上就发表了他的作品。以后在三月号、五月号和七月间出版的停刊号上都分别刊登出他的诗作。在该刊创刊号的“编后记”里，光慈还把宪章向读者作如下介绍：“宪章是我们的小兄弟……他的革命诗歌里流动的情绪比火还要热烈，前途是极有希望的。”

他的曾经印行的唯一的诗集《梦后》也是在他到上海后才自费出版的。当时他还是个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而作品的内容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又肯定会给书店或出版社带来麻烦，当然不容易找到印行的地方，只好掏腰包自费出版。

诗集出版后，作者曾送了我一本。记得封面印得满漂亮，书名是宪章自己的笔迹。可惜在以后一长串的动荡生活中，书籍失散，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本亡友的遗作。

宪章是一九二八年秋离开上海赴日留学的。到日本后，他住在东京，并没有进什么正规的学校，只是努力学习日语。由于他的勤奋，不到一年功夫，就达到了可以阅读并开始翻译日本文艺书刊的程度。他的译作中，如后来在国内出版的《叶山嘉树集》和《新兴艺术概论》等等，都是他在留日期间着手翻译的。也不妨说，正是由于着手搞翻译，这就使他的日语水平提高得更快。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和光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也来到了东京。光慈是为了养病来到那边的。不久，适夷也来了。

由于宪章比我们先到日本一年，一般情况已颇熟悉，日语也讲得比较流利，所以，他无形中变成了大家的义务向导和翻译；他也满腔热情地乐于为我们服务。比如光慈到东京后，不论是找旅馆、买东西以及跟日本作家联系等等，有许多都是由宪章一手经办的。

我跟适夷到东京后，最初都跟宪章住在一家名叫“青光馆”的公寓里，光慈的住处也跟我们所住的公寓相距不远。因此，我们常常碰头。后来，为了便于共同学习和交换意见，由光慈建议，我们成立了太阳社的东京支部（支社）。支社成员，除我们几个人外，还有伍劲锋、古公尧、胡晓春等人，他们都是留学生中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作者。

在支社的建立和后来的活动中，宪章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当中，有好些中共党员，而且已经建立了党组织。宪章到东京后，也积极地参加了工作和活动；后来党组织还跟日本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日本当时是个臭名远扬的“警察国家”，怎能容忍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它的心脏里战斗？于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下子逮捕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宪章、伍劲锋、古公尧都被捕了。

宪章在异邦的囚牢中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释放后即被无理遣送回国。

在他们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十月三日》的短诗，如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此诗后来曾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拓荒者》创刊号上。

宪章回国后，依旧努力从事革命活动，勤奋创作和翻译，出了不少的成果。

一九三〇年三月当左联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时，他参加了成立大会。可是，不久他就在一次示威行动中不幸被捕，并被判了三年徒刑。

记得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我还在东京。有一天，忽然意外地接到他从牢里设法托人辗转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他在狱中病得很厉害（脚气病？），要我想办法在上海找一个熟人给他捎一些钱和衣物去。尽管那是寄自狱中的信，而且他又在大病当中，但字里行间却没有透露出半点悲观情绪。啊，我们的诗人是多么坚强啊！……

一直使我感到万分遗憾的是：我收到这封信太迟了！当我一时还来不及写信到国内嘱托适当的人去办这件事时，上海已传来了宪章病殁在狱中的噩耗！

宪章的去世后，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进步文艺性小型报《文艺新闻》，曾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第二十三号上报道过一条实际上是“讣告”的有关消息。根据这条消息来推测，宪章病故的日期大致是在八月十日左右。

我们知道，革命诗人蒋光慈也是于同年同月在医院中悲惨而寂寞地病逝的。

因此，一九三一年八月，对于当时的左翼文艺阵营来说，真是多个多灾多难的、带来巨大损失的、叫人伤心的月份！

是谁使得光慈和宪章死得这么早、这么悲惨的？是谁使得中国左翼文艺阵营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巨大损失的？其罪魁祸首当然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

记得在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记述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文章，其中谈到光慈去世前后的情况时，我曾写下如下一段话：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革命诗人蒋光慈之死，表面上虽是由于疾病，实际上是给国民党反动派用无形的刀枪杀死的！”

我认为：用这同样的词句来表达诗人冯宪章病故狱中的实际情况，是完全适合的。

可是，宪章的身后却比光慈还要来得凄凉！无论如何，光慈去世后，灵柩还得妥善保存，解放后又由上海文联迁葬于虹桥公墓。而宪章呢，病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狱中，尸骨早就不知道被他们抛弃到什么地方去了！……

宪章的遗著（包括创作和翻译）颇多，业已出版的单行本有：《梦后》（诗集）、《叶山嘉树集》（翻译小说）、《新兴艺术概论》（文艺论著）等；散见在《太阳月刊》、《我们》、《海风周报》、《拓荒者》、《沙崙》等期刊的诗文和翻译作品有：《致一》、《战歌》、《致被难的朋友》、《心坎里的微音》、《警钟》、《匪徒的呐喊》、《三·一八》、《是凛烈的海风》、《游移》、《没有劳动者的船》、《德国的新兴文学》、《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之哲学的考察》、《〈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废人》、《一月十三》、《楼头艳笑》、《给劳动者》、《我是叛乱运动的歌者》、《集团的意志》、《盟誓》、《在花冈岩中》、《夜更》、《歌者》、《给异国同胞们》、《1919年5月1日》、《清晨》、《工场的儿子》、《“诗人”这傲慢的语言》、《赏失》、《“最后的自由”》、《“穷人”的最后一段》、《呐喊》等等。最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宪章的诗集，除业已出版的《梦后》外，他生前还编好过三本诗稿，并已交到书店，准备出版；可是后来不但书没有出版，连原稿也已失落，无从找寻了！